

乡音何处去：浙江开化桐村闽南语 方言岛调查¹

任泽栖、陈敏扬、林丽鸿、衣莉

摘要：方言是社会语言身份构建的支点，加强方言研究有利于促进社会的互动与整合。本研究旨在以浙江开化桐村闽南语方言岛村民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为切口，总体把握其乡村语言面貌，在探讨“乡音何处去”、描述方言使用现状的同时，试图挖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调查发现：桐村的闽南语在现阶段依然是当地占据主要地位的强势方言，且该地的方言使用在宏观上受移民历史、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影响，在微观上受宗族观念、家庭语言格局、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

关键词：语言认同；开化方言岛；方言传承

作者：衣莉（通讯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方言音系和社会语言学。邮箱：15011191106@163.com；任泽栖（第一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本科生，研究兴趣主要为语言社会学。邮箱：clara125117@163.com；陈敏扬（第二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本科生，研究兴趣主要为传播学。邮箱：joyxiao huanggou@163.com；林丽鸿（第三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本科生，研究兴趣主要为社会语言学。邮箱：linlh4566@163.com。

1 本研究得到国家大学生创新项目“语言认同在乡村人才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浙江开化桐村镇为例”（202310019062）的支持。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章如有遗漏，责任由作者承担。

Title: How Have the Local Accents Evolved? A Survey of Hokkien Dialect Island in Tongcun, Zhejiang

Abstract: Dialects serve as crucial elements in shaping social language identities, foster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nhancing integration with communities. This survey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use of dialects and language identity within Tongcun, a reg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known for its Hokkien dialect, with the aim of illustrating the current linguistic landscape, discussing the trajectory of dialect evolution, and uncovering the underlying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okkien dialect remains prominently prevalent in Tongcun. Moreover, the language identity among villagers exhibits distinct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variations on a broader scale, whil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contribute to nuanced differences at a micro level.

Keywords: language identity; dialect island; dialect inheritance

Authors: Yi Li,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i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onal phonology of dialects and sociolinguistics. Email: 15011191106@163.com; Ren Zeqi, the first auth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mail: clara125117@163.com; Chen Minyang, the second auth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mail: joyxiaohuanggou@163.com; Lin Lihong, the third auth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i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mail: linlh4566@163.com.

一、引言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桐村镇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方言岛。据《开化县志》记载，桐村镇 90% 的村民是 300 年前福建泉州移民的后代²。时至今日，闽南语仍是当地的主流方言，但随着对外联系的增强与普通话的普及，当地闽南语的传承也正面临着一些困境。总体来看，桐村镇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各地方言文化逐步弱化的一个缩影，而作为政治中心与交通枢纽的桐村，人口构成复杂、语言种类丰富，又是桐村镇中的典型。因此，不论是在研究方言正面临的

2 开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化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 年。

困境方面，抑或是在探索如何传承与发展方言文化的道路上，调研浙江开化桐村的历史与现状、描绘当地的语言面貌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认同，国内外诸多学者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Joseph 认为，人的身份由其姓名以及更深层次的事物组成，而人对自我认同的根源便在于语言³。在 Bucholtz 与 Hall 看来，身份是语言及相关符号实践的产物，身份认同的产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⁴。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仅会反映个人的身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其所处的具体环境⁵，这意味着语言具有影响群际定位与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⁶⁻⁷。而语言身份认同在求同的时候，也会存异，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差异性就是通过语言和其它指示符号加以表现的⁸。也因此，对语言认同的探究无论如何都需要结合语言使用者所处的特定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才能展开具体讨论⁹。

综上所述，对于语言认同的研究已有诸多积累，涵盖内容广泛、研究方法成熟。通过文献梳理也不难发现，中国对于方言岛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情况调查虽然不少，但更倾向于对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描写，对方言与社会互动的探讨却鲜有涉及。因此，本研究旨在以浙江开化桐村闽南语方言岛的语言使用与方言认同为切口，在探讨“乡音何处去”、描述方言使用困境的同时试图挖掘其

-
- 3 John Joseph.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2.
 - 4 Bucholtz, Mary and Kira Hall: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2005, pp.587-591.
 - 5 Pennebaker, J.W., M.R. Mehl, and K.G. Niederhoffer: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Natural Language Use: Our Words, Our Sel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3, pp. 547-577.
 - 6 Tong, Yuk-yue, et al: *Language Use as A Carrier of Soci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9, pp. 281-296.
 - 7 陈睿、胡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语言身份认同》，《学术界》，2018年，第177页。
 - 8 周庆生：《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73页。
 - 9 Wei, Li Ed, and Melissa G. Moyer: *The Blackwel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in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p. 743-746.

背后的影响因素。文章首先综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和本研究的必要性；接着详细介绍了调查地的概况和研究方法；之后从案例呈现与案例分析的角度描写开化桐村闽南语的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情况；最后给出本研究的总结和思考。

二、调研地、研究对象与调研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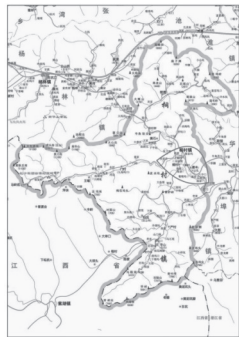
（一）调研地与研究对象

开化坐落于浙西边陲、钱江之源，是三省七县交界之地。自古以来，赣闽浙等多种文化就在此地交织共融，孕育了形态多元而兼容并蓄的乡土文化，积淀了丰富而别具一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据《开化县志》记载，三百多年前，桐村镇人的祖先因清朝海禁政策从福建泉州迁至此并在当地长期定居，如今桐村镇大部分居民为闽南后裔¹⁰。

桐村镇现辖9个行政村，其中，镇政府所在村落地名为“桐村”，总人口2,655人，村域面积12.74平方公里。桐村镇桐村居民移民历史复杂，除了福建移民的后裔，还有少量的新安江移民和同县其它村镇的移民，含有闽南语、华埠官话、淳安话、开化话等多种语言。而本研究则选在人流量最大、人口构成最为复杂、涵盖语言种类最为丰富的桐村镇桐村展开。

2010年，自然村桐村与建平合并为行政村“桐村”，下辖的村民聚居小组共20个。本文提到地名时，依据当地村民的使用习惯与自我认同方式，使用“小组”这一划分标准，此处的小组为以往农村里生产队的分片称呼。此外，本研究调研地聚焦于桐村村内以镇中心鲁家坞为圆心展开的扇形辐射区域（见图1），该区域内的小组在方言使用与人口构成上均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10 开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化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

图 1：桐村镇行政地图与研究范围

资料来源：桐村镇政府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桐村居民。在选取研究对象时，本研究主要采用目的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基于以下考量：运用目的抽样，选择提供必要信息的人作为访谈对象，可以使访谈对象更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且由于研究者前期入场困难，能接触到的可提供有效信息的桐村闽南移民有限且类型单一，故在访谈中采取滚雪球的方式，求助于已经建立关系的群体，以此扩大访谈对象的范围。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法、观察法与入户访谈法。

在进入田野前，团队先开展了资料收集与文献梳理工作。队伍在开化县图书馆、开化县档案馆、桐村镇政府、桐村镇文化馆等地，收集了大量文献与视频图片资料，并筛选出有效信息，填补了先前的资料空白。进入田野点后，为了解不同人生阶段、生活背景、年龄以及性别的研究对象在生活中具体使用语言的情境，本研究采用观察法，观察与记录了部分语言使用情境。最后，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依托村委网络选择当地较有代表性的村民入户，通过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真实语言使用情况，以及其对待闽南语言文化的态度，并与观察法结果相互验证。

三、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案例呈现

在方言构成方面，桐村大部分村民是闽南移民后裔，村民主要讲闽南语。除此之外，在桐村，杨家小组的开化本地移民说开化

话，八字门、江家边的少数新安江移民说淳安话，在桐村西侧毗邻华埠镇的几个小组中，也有部分村民说华埠官话。下文将描写几块典型的村民聚居小组的语言使用情况。

（一）鲁家坞

鲁家坞位于桐村镇中心，靠近公路，是当地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其地势平坦，街道规划清晰，交通便捷，镇政府、派出所与镇上的大企业密胺厂均位于此。镇中心的街道名为“桐花路”，鲁家坞的人家基本沿着这条路分布，街道两旁商铺众多。交通便利与经营环境良好使得鲁家坞的人流量较其它组更大，人员构成也更为复杂。而生意上的往来也让这里的村民与其它村庄的交往更加密切。

鲁家坞并没有姓“鲁”的人家，长居于此的村民既无大姓，也鲜有宗族。各家各户对自己祖上的事情不甚了解，仅知道自己或许是闽南移民的后裔。除此之外，鲁家坞的居民既无追根溯源的念头，也鲜有对宗家的主动联系。偶尔有部分福建的宗亲来联络鲁家坞的族人一同修谱，但此处居民也以“距离遥远”这一理由拒绝了返乡修谱的邀请。并且，因为这里是镇政府所在地，土地规划与管理都更为严格，所以当地没有任何宗祠。

鲁家坞的居民基本都讲闽南语，他们自称是“土话”。且其它地区外嫁过来的媳妇为了与不会讲普通话的公婆交流也会学习当地的闽南语，部分会听不会说的在平时交流中则会使用更为简单易学的华埠官话。而外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技师则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话。在鲁家坞开店做生意的人家更倾向于认可普通话在各地的实用性，而闽南语仅限于当地使用。在这里，大家对闽南语传承的现状和未来普遍表现出“无所谓、没有期待”的态度。

（二）上桐村、刘家湾和下桐村

上桐村、刘家湾和下桐村位于桐村北部，村民聚居于小丘上，整体地势较高，距离镇中心近。这几个小组并无宗祠，但有部分村民家中供奉着宗族的牌匾。

此三处的村民最常用的方言为闽南语，他们将其称为“家乡话”“桐村话”或“土话”。但在个别家庭中，华埠官话也是家庭常用方言之一。当地 50 岁以上的老人使用闽南语的频率相对年轻

人更高，年轻人基本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但也有个别年轻人会讲闽南语。相较而言，这些会说闽南语的年轻人大多处于闽南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家庭中。

对于自己“闽南移民后裔”的身份以及祖先的移民史，当地村民的了解情况不一，自我认知也各异。部分村民对“祖先是否来自闽南”完全不知晓，部分村民则非常确定自己闽南后裔的身份，但是对具体的移民史并不甚了解，大多数人都表示“有可能就是以前从福建移到那边去的吧，具体是不清楚”。不仅如此，当地村民普遍认为如果不提前教孩子说普通话，孩子“后来到了学校一下子很难懂进去”，害怕耽误孩子学习。而对于后辈是否要学习闽南语，大多数村民都持有顺其自然的态度，认为“闽南语孩子能听得懂就行了”，不打算过多干预。

（三）宋家庄

宋家庄位于桐村西部，村民房屋排布紧密。此地人数较多的三大姓氏为范、陈、廖，其中范姓人数最多，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组内并无宋姓人士。三大姓氏在当地均建有宗祠，一些家庭中还奉有堂号牌匾、族谱与宗谱。当地村民相对熟悉自己的移民身份，基本知晓自己的祖先来自福建，但具体的迁徙时间及原因都相对模糊。

宋家庄的村民交流以闽南语为主，但是闽南语熟练程度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当地的25岁以上村民基本都能听懂并熟练使用闽南语；年轻一辈的人大多只能听懂闽南语，但“不是特别会说”，或者自我陈述为“以前会，但是现在逐渐忘记了，就只会一些”，因为“上学跟同龄人交流都是用普通话的，回家来也习惯讲普通话”。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语言使用上宋家庄的年轻人较少使用闽南语，但对方言传承的意愿比村中年长者要更加强烈。年长一点的村民大多持有“方言有什么好传承的”的态度；但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却认为小孩没有方言培养，“感觉还是有点可惜吧”，认为现在“社会上讲普通话可能就不会特别在意他们说方言……但感觉反正还挺需要的，虽然可能现在大家也不太重视”。

(四) 黄家、南垄

黄家和南垄小组的村民聚居于桐村南部的小山丘上，整体地势较高。当地居民居住较为集中，黄家以黄姓村民居多，南垄以吴姓村民居多，兼有郭姓。两地均有宗祠分布，祭祖时村民或前往宗祠或直接扫墓。当地部分村民的婚娶习俗和辈分意识受宗族影响较大，对自己祖先的福建移民史了解较为模糊。

黄家和南垄的方言环境相对复杂，在地理位置上这两个小组比较靠近华埠，因此也有不少说华埠官话的村民。又因为黄家、南垄与新安江移民所在的建丰村邻近，日常交往、联姻或迁居等也使得一些村民会说新安江移民的淳安话。而对于年轻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当地人则表示“小孩子们好多都是讲这个普通话了”。

除此之外，当地村民的语言态度也受到普通话影响，倾向于以功能性来衡量闽南语和普通话的重要程度，“潜意识里是想到他肯定要上学的，普通话为首要标准”“现在都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说普通话”，因而选择让自己的孩子直接学习普通话。在语言期待方面，村民普遍认为孩子只要在本地的环境中生活，就能学会闽南语，认为“闽南话真要失传也要等好多年后吧，几百年后吧”。

(五) 下江头、施家、葡萄坞

下江头、施家与葡萄坞位于桐村镇东南部。其中下江头与施家靠近开化县华埠镇，地势平坦、田野广阔，且下江头与建丰村仅隔一条公路。而葡萄坞则地处周边山脚，交通闭塞，整组规模很小，仅有两户住户，一座教堂与一个养鸡场。三小组均无宗祠，且三个小组的村民大都至少掌握闽南语与华埠官话两种方言。下江头居民因靠近以新安江移民为主的建丰村，大多能听懂淳安话，但不会主动去学习淳安话；反之，当地能讲闽南语的新安江移民则不在少数。

与其它小组不同的是，葡萄坞有一座基督教堂，每周日都有桐村镇各村的信徒前来做礼拜，参与成员以当地的中老年女性为主。她们交流大多使用闽南语，但为了祷告会特意学习普通话的赞美诗，宗教信仰的驱动加强了当地人习得普通话的主动性。且由于当地的年长女性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存在“会说一些普通话但不识字”的现象，因此解读《圣经》、唱赞歌这一举措也成为她

们学习使用文字的重要途径。

此外，葡萄坞位于桐村镇与华埠镇的交界处，因此该教堂同时接待两镇的基督教徒。教堂礼拜为众人聚集交流、学习语言提供了条件。而在疫情期间，许多信徒会在教会的组织下学习通过手机在线上参与集会、做祷告和唱赞歌，这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电子产品使用格局。不少村民也在此期间学会了使用手机来学习普通话。

（六）八字门、江家边

八字门和江家边均属桐村镇东南部，接近华埠镇，交通便捷。八字门和江家边均有大姓，八字门中为吴姓，江家边中为陈姓与万姓。八字门居民里既有闽南移民，也有不少从相邻的建丰村迁进的新安江移民。

闽南语是本地大部分村民的第一方言。因此，当地的新安江移民出于邻里沟通的需要学习起了闽南语。其中，较为年轻的新安江移民大多能够用闽南语与其他村民正常交流，虽然有时觉得“发音不标准”“别扭”；而80岁以上的新安江移民往往表示学不会闽南语，平时只会说淳安话的乡亲交流。除此之外，华埠官话也是当地的“主流方言”，当地村民“一般是同时讲闽南语和华埠官话”。一方面，华埠镇和桐村的村民经济交往密切，常有生意往来，交流推动村民的语言习得；另一方面，当地与华埠镇的婚嫁往来频繁，婚嫁促成的人口流动也变相推动了语言的交流和学习。从华埠嫁入江家边的女性就表示“我反正来了就会讲闽南语”，而桐村本地人有了“华埠姻亲”后也会学习起华埠官话。

江家边陈氏早年是宗祠的，但后来宗祠被烧毁。没有了宗祠这一物质载体，本地的宗族观念也在更为快速地淡化。而外出工作、维持生计的经历则让本地村民们在教育后代时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效用和工具性，往往优先选择教后辈学习普通话。

（七）杨家

杨家位于桐村的东南部，地处山腰，地势较高。此处距离桐村其它组均有一定距离，相对华埠较近，但山腰环绕、山河相夹的地理环境也使其自成一个小的区隔。杨家不同于桐村的其它组别，它既不像八字门一样有新安江移民，也不像江家边组中大部分都是闽南移民。杨家的村民都是从开化县池淮镇白渡村迁移而来的“开化

本地移民”，这里村民的通用语言为开化话。

杨家组是此地原有的组名，但实际上杨家并无杨氏，此处有大姓为魏姓。魏氏人家在此地曾有宗祠与宗谱，后因历史原因被烧毁。并且相较于村中其它重视宗族祠堂的小组，此地居民对宗族的感情更为淡漠。在语言使用情况方面，此地的开化移民常使用开化话与简易通行的华埠官话，而为了与桐村镇本地的闽南移民交流，也有不少杨家人学会了闽南语。如在镇上买卖东西时，便有许多杨家人用闽南语同店家进行交流。

在语言认同情况方面，杨家年轻人多外出打工，鲜少在本地常住。外出务工者更认同普通话的工具性与实用性。而对于方言的使用，久居家中的年长者认为方言应当传承下去，且对下一辈的方言教育比较重视，“我让儿女先教方言，小孩子上幼儿园老师一教就会说普通话了”，但年长者也表示会尊重子女的教育意愿，最终还是会对“先教普通话”这一举措妥协。

四、案例分析：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的影响因素

（一）宏观影响因素

在桐村，影响当地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的宏观因素主要有移民历史、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

桐村镇的语言文化十分具有特色，这与其地处浙皖赣三省交界地带所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也因其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桐村当地主要的移民群体为闽南移民。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倭乱、海禁等原因，大批闽人迁居北上。时年赣东北逢“三藩之乱”，丁缺田荒，大批闽南人随政府招垦的指令从福建泉州等地迁入江西。而赣闽浙三省地理位置接近，战乱之后邻近赣闽的浙江衢州开化山区多荒村，也因此有部分闽南人或借道江西、或直接移居至浙江省西南部¹¹。如今浙江开化桐村全村大部分居民为闽南后裔，含有少量新安江移民与开化本地移民，语言使用的种类与格局也由这一移民历史奠定基础。

闽南人迁徙至本地时，桐村土著居民受战火牵连已所剩无几。

11 林汀水：《福建人口迁徙论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4-15页。

依托原住民的房屋和田地，闽南人在桐村建立了自己的家乡。因为是在旧有村落的基础之上重建家园，他们保留了原来村庄的布局、名称，这就是为什么当地有许多村民小组明明叫“宋家庄”“鲁家坞”，却没有姓宋、姓鲁的人士。值得注意的是，闽南移民来到桐村时，田地广阔，他们可以选择适宜的居住空间，在此地繁衍生息，并将语言文化较好地传承下去。

紧随闽南移民迁移而来的，是开化当地池淮镇白渡村的移民。他们来时选择在杨家定居。杨家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让他们的语言得以较好地保留了下来，但群体稀少的事实、并不强的宗族观念、缺乏宗祠与宗谱等记载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也让开化移民在历史进程中忘却了自己的迁移原因。且大部分开化本地移民后裔都会讲闽南话，存在被当地闽南群体及其文化同化的现象。

而新安江移民则是当地的新移民。1959年新安江水库移民来到桐村镇后先在各村安置，主要安置在裴源和华山村，大部分寄住在当地村民家中。两年后以容纳新安江移民为目的的建丰村选址建村后，新安江移民得以独立建房，便统一迁移至建丰。而建丰村为后来新建，主要土地用于搭建房屋，村民人均耕地少，所以需要向街对面的桐村八字门、江家边、下江头租借使用耕地。再加上人口增加的压力，近几年建丰村的新安江移民也渐渐向邻近的桐村区域迁移，淳安话的使用范围也在渐渐扩大。

除了移民历史之外，影响桐村语言使用格局的因素还有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

开化多山，而桐村镇聚落则多分布于山谷平地之间。山山相望、夹道狭长，这样的地理位置导致桐村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也正是这封闭不便的地理环境与交通条件，使得闽南文化在时代更迭中被桐村镇较好地保存了下来。时至今日，当地仍然保留着闽南小调、宗族祠堂祭祖等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风俗，也保留了相对完整的闽南方言。

整体来看，在桐村地理分布偏西北的上下桐村、宋家庄等地，村民日常使用闽南语频率非常高，很多村民基本只会这一种方言，因为他们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分布更加集中。而与华埠镇毗邻，位于东南部的下江头、八字门、江家边等地的村民形成了以闽南语为主、华埠官话为辅的语言使用格局。且华埠镇作为开化县的交通枢纽，华埠镇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皆胜于桐村，会讲华

埠官话的双语现象在桐村，特别是与华埠镇毗邻的江家边、下江头、施家等地很普遍。

此外，作为镇中心的鲁家坞不仅是当地的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有很多来自本县其它镇的从业人员、政府干部和个体户，一方面闽南语仍是此地使用频次最高的方言，另一方面华埠官话、开化话也成为此地的高频使用语言。杨家的居民为开化本地移民，又与桐村其它小组形成一定区隔，使用的语言多为本土的开化话，仅在进镇采购与镇上居民交流时使用闽南语。

（二）微观影响因素

移民历史、地理交通影响桐村宏观上的语言分布和语言使用情况，而指导当地村民日常生活中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的因素，还主要表现为宗族观念、家庭语言格局和受教育程度。

大体上而言，宗族聚居情况良好、保留有完整宗谱与宗族祭祀仪式的村落和家庭对于闽南语的传承更为看重，也更相信闽南语会往积极的方向发展。如有宗祠与宗谱传承的宋家庄、黄家和南垄，其居民更为认同闽南文化，也更有意愿传承闽南语言。而在人员构成复杂、与外界交往频繁的鲁家坞、八字门与江家边等地，没有宗族的聚居与宗族文化的支持，其闽南移民在与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会更看重普通话、华埠官话的经济效用与工具性，并在对下一代的语言教导环节中更倾向于教授普通话。

且如今，在桐村当地只有以范氏为主的宋家庄和以黄姓为主的黄家组等建有小型宗祠，供家族节日祭祖使用，当地的宗族观念不断式微。对于远迁至桐村的闽南移民而言，他们现仅将闽南语视为一种单纯的交流工具。而一旦承载着记忆、情感和传统智慧的语言不再具有族群身份建构和促进自我认同的功能，它就很难不被更为广泛使用的普通话或其它简便易学、功能性更强的方言替代。换言之，这里的方言正因为宗族观念和社会联结的淡薄而逐渐丧失其独特性和受众群体。

除此之外，家庭语言格局也会对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产生影响。当一个家庭中人员构成越丰富、语言格局越复杂时，家庭成员对特定语言传承的期待便会更低。如在访谈中，家庭成员构成复杂的受访者会说，“我讲本地话，我妻子讲她们那里的方言，你说让小孩学哪种方言好”“我老公是杭州的，都不会讲闽南

语，小孩跟我们聊就用普通话就好了”等等。可见，家庭人员构成与家庭语言格局会影响家庭对下一代学习方言与否以及学习何种方言的期待。

总体来看，家庭语言格局对家庭成员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的影响在于优势语言会倾倒地占据家庭成员的日常交流。而一旦出现家庭成员中，尤其是抚育孩子的一方亲属不会家庭中的“优势语言”，那么更为简单易学的官话和通用的普通话则会在代际之间的交流中使用频率突增。

不仅如此，在义务教育和普通话普及的大背景下，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强，村民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增加，普通话的使用频率上升，在交流时发现“社会上主要讲普通话”，因而在语言态度上认为普通话相比方言有更强的功能性。也因此，桐村居民在对年轻一辈进行语言教育时更倾向于直接教授普通话，以“普通话为首要标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闽南方言与特色文化被外界冲击、文化融汇的今天，虽然当地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于闽南文化的眷恋和依赖感不如长辈深厚，但部分年轻人对于闽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意愿却显得更为坚定。

在多次深入访谈和反复追问之下，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归因于教育的作用。尽管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桐村的年轻人不常使用闽南语，语言使用频率的降低带来的或许是语言认同的淡化。但在中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是义务教育中必然会涉及的部分。对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们而言，他们或许会看淡方言所承载的情感和内涵，却也不会轻易地否定方言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教育为年轻人带来了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载体的珍视。不过，教育环境的变迁也不都是对保护和传承方言有利的。

在学校教育方面，桐村中仅有一所集幼儿园和小学于一体的桐村中心小学，不同于八零年代的孩子自小接受到的都是本地教师的教导，可以接受同语言环境的教育，如今的桐村中心小学都是一些外调过来的老师。跨县市调整和频繁调岗的乡村教师来自他乡，这意味着他们并不具备短期之内掌握闽南语的条件，学校场所也不再具备提供方言日常交流和方言教育的土壤。而在孩子尚不会良好表达自己意愿的幼年时期，无论是孩子听不懂教师所说的普通话而困惑、不安，抑或是教师听不懂孩子的方言因此无法第一时间照顾到

孩子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这些情况都是家长们所不容的。

不仅如此，事实上，桐村中心小学的招生情况已经随着乡村空心化而岌岌可危，六个年级一共只有四五十人。而除却本就居住于桐村镇中心的居民，更多居民愿意将孩子送往师资更好、生源更丰富的华埠镇里的小学就读。并且，桐村镇上并无中学，当地的孩子读完小学后就会前往华埠镇或开化县就读初中，随后再视机会流动到华埠、开化、马金等地就读高中。在这样的学校教育环境的要求下，“学好普通话”成为村民们的共识，对下一代传授普通话也成为了他们的优先选择。

总而言之，可以认为，在宗族观念和使用人群人口特征的影响下，闽南语仍是桐村村的第一方言；而更多分支语言如华埠官话、开化话则表现为复杂家庭语言格局情况下，家长的替代选择。总体来看，家庭成员的使用语言主要由家庭语言环境所决定。年长者对方言的使用频率更高，情感联结更深，而年轻人因为教育的介入则表现为尽管方言使用情况不容乐观，但对方言的价值和传承持以审慎的态度。且无论如何，普通话都在各个家庭中的各年龄层占据重要地位。教育因素在本村表现为当下的教育环境使得家长在对幼年孩子语言教育的选择上更偏向于教授普通话。

五、总结与讨论

研究发现，在桐村镇中闽南语依然是现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优势方言，另有华埠官话、开化话、淳安话等方言交错使用。宏观上，该地的方言使用受移民历史、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微观上，当地居民对语言使用的选择受宗族观念、家庭语言格局、年龄大小、教育程度等影响。

在地理分布上，桐村的闽南语占据的范围最为广泛；其次是华埠官话，其主要分布在与华埠镇交界的村落，也有随婚嫁、人口迁徙等散落分布在桐村各地的情况；接着是分布范围相对集中且使用人数有限的淳安话，以建丰村附近的江家边、八字门等组别为主要据点；最后是集中分布在杨家小组、偶有点状扩散至其它小组中的开化话。此外，也有其它零散方言通过人口流动携带至此，但无论是其规模人数抑或是其传播范围，都不足以发展成气候。

在语言使用情况上，自然地理的分布加之移民历史因素的影响

使得桐村镇形成当下“闽南语为主，华埠官话与淳安话、开化话错落有致”的缤纷语言格局。交通条件的差异使得相对封闭的居民村落和商业街区、靠近华埠的村落有细微不同。以鲁家坞为例的商业街区人口构成复杂，人口流动程度高，语言态度开放，普通话及多种方言在此交替使用；而相对封闭、交通不便的小组则语言丰富程度较弱。在家庭中，宗族观念为语言的传承与延续提供理由，但宗族文化的逐渐式微也在影响着村民的语言使用选择。总体而言，“工具性”“实用性”逐渐在语言习得的原因中占据上风。闽南语发展与生存的空间呈现压缩的趋势，倾向于从“公私领域并存”转向至“私领域”，社会文化功能的认可度降低。尽管出于工作、经济往来和联姻的需求，此地居民大都能够在生活中学会闽南语，但互联网、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推广也使普通话势不可挡地占据了各年龄层村民语言学习的高地。

在语言认同情况下，老一辈对于祖辈的迁移史和宗族谱系了解程度更深，更看重语言所承载的情感因素和族群认同载体的功能，从情感上对于方言传承保护的重视程度更高。而年轻一辈在“推行普通话”的教育环境下成长，更为看重语言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在闽南语的语言使用和认同上均呈现减弱的趋势，但受到教育影响，其中部分群体在对保护方言文化的态度更为坚定。在对于子女教学语言选择的意愿上，随着教育环境的改变，“能够与外调过来的乡村教师更好进行交流”成为了新一代家长们更希望先教授孩子普通话的重要原因。

总体来看，当地的主流方言闽南语受到影响的因素是复杂的，与此同时，虽然桐村镇闽南移民传承的闽南语在该地方言交流环境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对语言“工具性”“实用性”需求的追求下，普通话习得的空间越发广泛，以闽南语为代表的方言的重要性，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也渐有被忽视之趋势。加之被现代化文明冲击的宗族观念不断式微，闽南语的传承形势不容乐观。而尽管桐村各方言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认同情况存在“使用人群广泛但认同程度有限”这一错位现象，多元包容的社会语言环境、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的增多依然为桐村方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诸多可能。

参考文献

1. 陈睿、胡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语言身份认同》，《学术界》，2018年第5期。
2. 开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开化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年。
3. 林汀水：《福建人口迁徙论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 周庆生：《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1期。
5. Bucholtz, Mary and Kira Hall: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2005.
6. John Joseph.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7. Pennebaker, J.W., M.R. Mehl, and K.G. Niederhoffer: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Natural Language Use: Our Words, Our Sel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3.
8. Wei, Li Ed, and Melissa G. Moyer: *The Blackwel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in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9. Tong, Yuk-yue, et al: Language Use as A Carrier of Soci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9.